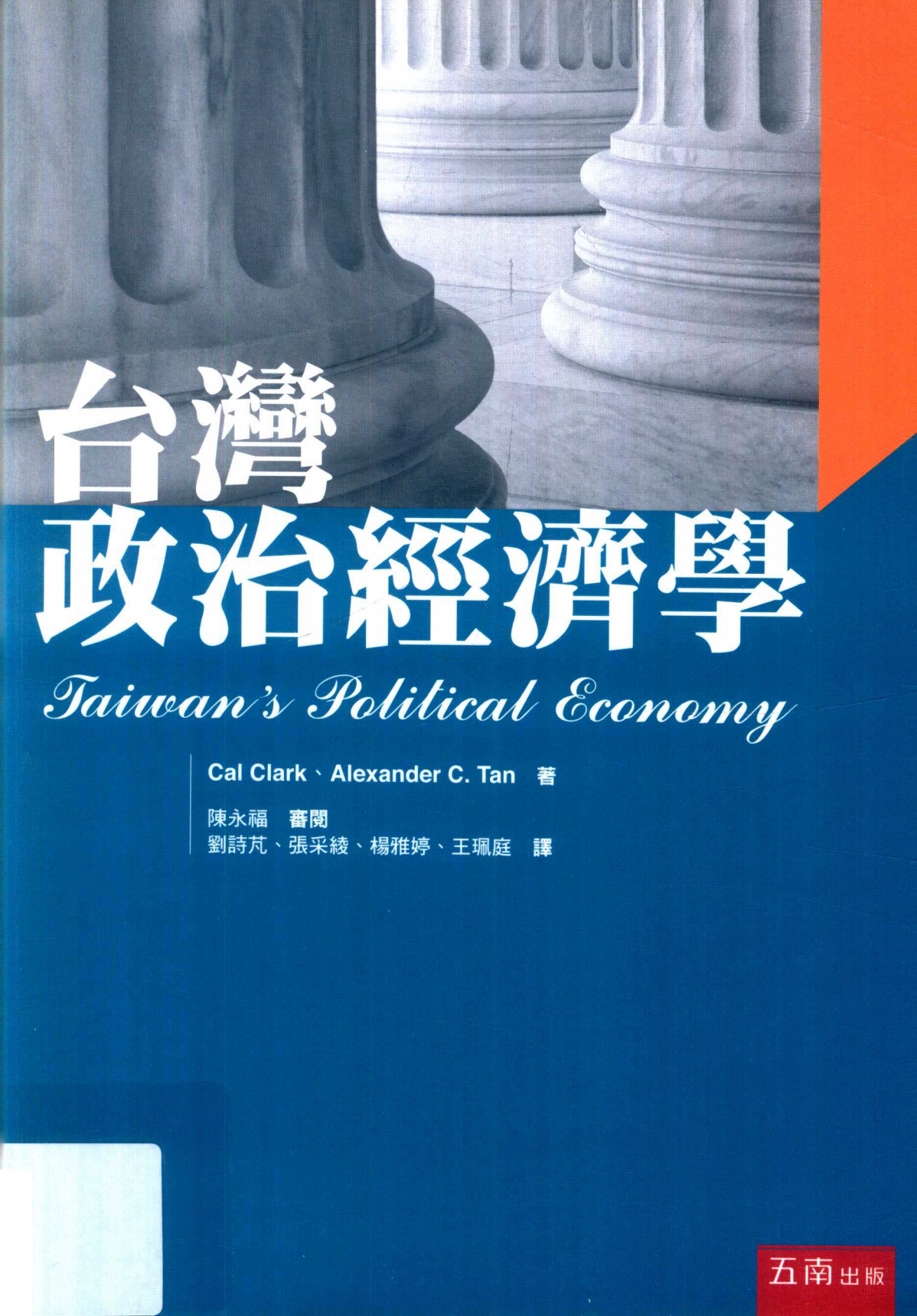




台灣 政治經濟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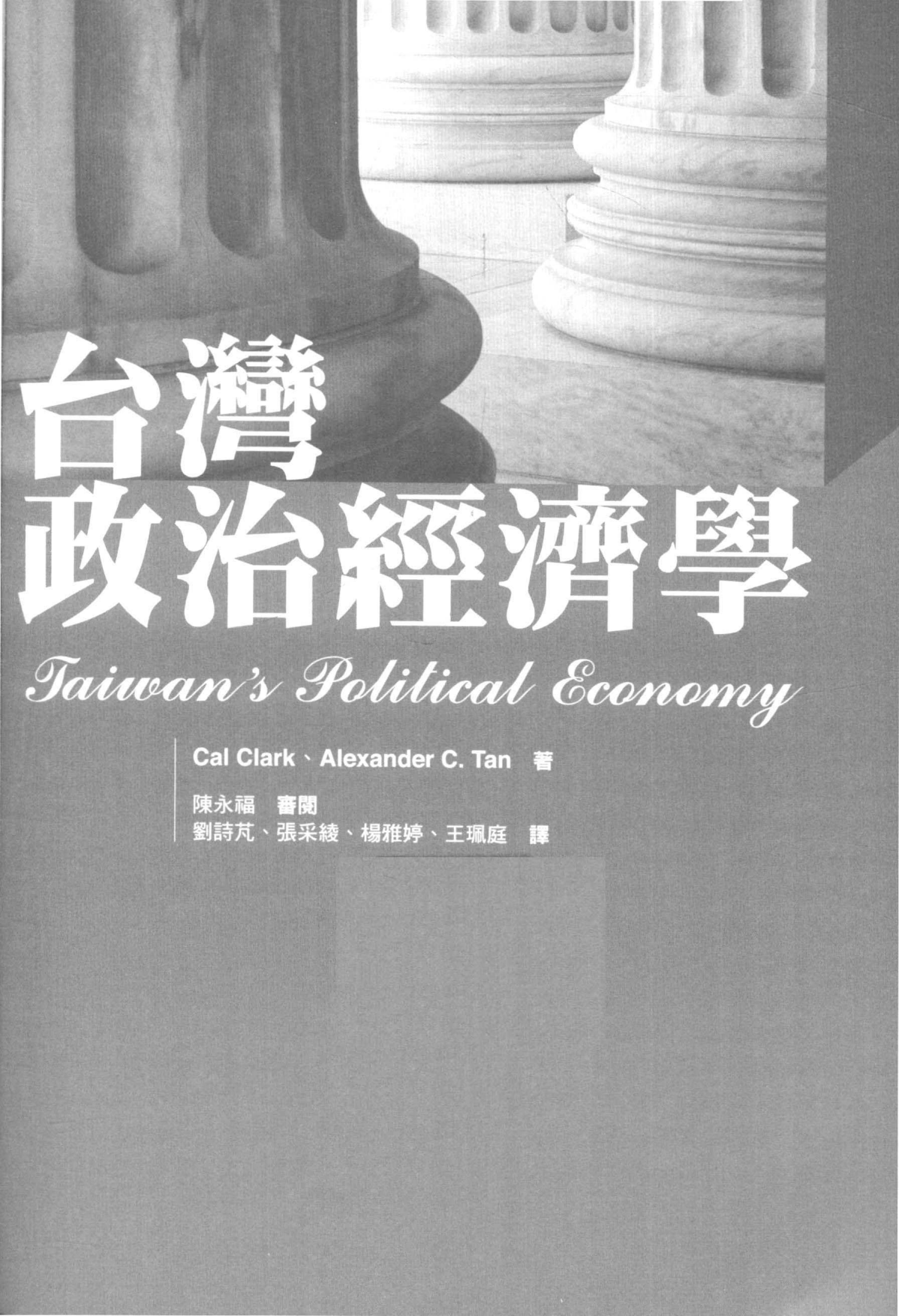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Cal Clark、Alexander C. Tan 著

陳永福 審閱

劉詩芃、張采綾、楊雅婷、王珮庭 譯

五南出版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classical columns, likely from a government building, serving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book cover. The columns are fluted and have papyrus capitals. The lighting creates strong shadows, emphasizing the architectural details.

台灣 政治經濟學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Cal Clark、Alexander C. Tan 著

陳永福 審閱

劉詩芃、張采綾、楊雅婷、王珮庭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政治經濟學 / Cal Clark, Alexander C. Tan 著 ; 劉詩芃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2016.06

面 : 公分

譯自 :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ISBN 978-957-11-8643-6(平裝)

1. 臺灣經濟 2. 政治經濟 3. 經濟史

552.339

105009091



1PAL

台灣政治經濟學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作者 — Cal Clark、Alexander C. Tan

審閱 — 陳永福(265.6)

譯者 — 劉詩芃、張采綾、楊雅婷、王珮庭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編輯 — 王翠華

主編 — 劉靜芬

責任編輯 — 吳肇恩

封面設計 — P.Design視覺企劃

出版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 : (02)2705-5066 傳真 : (02)2706-6100

網址 :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 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 : 01068953

戶名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16年6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280元

Copyright©2011 b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目錄

CONTENTS



第一章	台灣悖論	1
	本書規劃	3
第二章	經濟奇蹟	7
	從農業轉型	8
	出口榮景	11
	產業升級	14
	經濟成熟期	18
	塑膠：創業的動力	24
	技術轉移與台灣勝家	26
	國家在台灣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28
	台灣發展模式	32
第三章	民主轉型	35
	專制時代	35
	台灣民主轉型的政治協議	39
	台灣政黨制度的演變	45
	台灣政治的議題	52
	台灣的民主轉型：議題結構作為促進者和潛在挑戰者	60
第四章	出口導向成長的侷限	63
	台灣及其發展的一般程序	69
	中小企業的競爭力變化	73
	與中國經濟一體化的利益和風險	79
	二十一世紀初的經濟挑戰	95
第五章	民主化的危機	97
	台灣的制度糾葛	98
	金融業的政治化	108
	面臨著台灣的制度糾葛	115

第六章	政治的兩極化	117
	在國家認同議題上迸發的黨派兩極化	117
	對於國家認同議題爆發的解釋	123
	菁英兩極化與公民態度之間的分離	126
	理解兩極化與反常的策略	132
	兩極化、反常的政治策略以及向台灣挑戰回應的問題	137
第七章	面對成功的代價	139
參考文獻		145

表目錄

TABLES

表2.1	1952-1962年間每年實際的經濟成長（百分比）	10
表2.2	1952年與1962年經濟績效指標	10
表2.3	1962-1972年間每年實際的經濟增長（百分比）	13
表2.4	1962年與1973年經濟績效指標	13
表2.5	1974-1987年間每年實際的經濟增長（百分比）	17
表2.6	1973年與1987年經濟績效指標	18
表2.7	生活進步標準指標	21
表2.8	1988-2000年全年真實的經濟成長（百分比）	22
表2.9	1987年及2000年經濟績效指標	23
表2.10	國家在台灣經濟轉型中的角色	30
表3.1	台灣民主轉型的協議	41
表3.2	政黨的角色	46
表3.3	政黨制度對政黨功能上可能造成的影響	47
表3.4	台灣政黨制度的歷史	48
表3.5	主要政黨的選舉支持度（百分比）	49
表3.6	1990年代後期台灣政黨制度	51
表3.7	台灣民主轉型時期的主要議題	52
表3.8	1990年代對於兩岸關係走向最終目標的態度（百分比）	55
表4.1	從產品週期理論對比其意義	68
表4.2	全年經濟增長（百分比）	71

表4.3	經濟表現指標	72
表4.4	產業集中度指標	74
表4.5	台灣出口到中國	85
表4.6	兩岸貿易的不平衡	86
表4.7	由中華民國經濟部批准台灣投資中國的總貿易額	87
表4.8	1991 - 2008年台灣被批准在中國投資的產業（百分比）	88
表4.9	海峽兩岸的社會交流（百萬）	90
表4.10	兩岸交流影響大事記	91
表4.11	台灣人對海峽兩岸經濟變遷限制的觀點（百分比）	92
表4.12	2010年7月台灣人對於ECFA的觀點（百分比）	93
表4.13	馬英九政府時期，台灣人民對中國敵意的看法	94
表5.1	在世紀之交所通過的主要金融法規	113
表6.1	台灣公民的民族認同（百分比）	127
表6.2	外省人的民族認同（百分比）	128
表6.3	台灣國際地位的偏好（百分比）	129
表6.4	台灣人對於兩岸交流速度的看法（百分比）	130
表6.5	主要政黨的選民支持度（百分比）	131
表6.6	在立委選舉中選民對泛藍與泛綠的支持度	135
表6.7	台灣選民的政治效能感程度	136

圖目錄

FIGURES



圖2.1	台灣經濟結構的轉變	33
圖3.1	台灣民主轉型大事記	40
圖3.2	民主化如何緩和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議題	56
圖3.3	民主化如何產生金錢政治的動力	59
圖4.1	生產率增長的良性循環	66
圖4.2	主導型經濟活動以及生產力和GDP成長的S型轉變	67
圖4.3	在19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台灣及中國南部沿海一帶經濟整合的增長	81
圖4.4	中國和台灣之間的主權鬥爭	83
圖5.1	兩項政治制度產物如何被證實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是失衡的	98
圖5.2	中華民國政府架構	101
圖5.3	在民主台灣憲政改革中的主要回合	105
圖6.1	威權主義與民主化如何促成國家認同極化的模型	123
圖7.1	國家經濟角色的成功代價	140
圖7.2	台灣如何發展成功的成本	142

第一章 台灣悖論

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演變在台灣呈現出來的樣貌是十分矛盾的。自1960年代到1980年代，這個國家歷經了一連串被稱之為「經濟奇蹟」的經濟轉型。伴隨而來的是始於198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中葉一個成功的民主轉型，以這個國家長期處於威權統治的視角來看，這個轉型或許可以被視為「政治奇蹟」。因此在1990年代早期，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台灣可被視為一個成功的故事和模範。然而，經濟與政治轉型後並非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在過去二十年間中華民國面臨了一連串的挑战。

經濟上，台灣進步相當迅速，從1950年代的國內輕工業，到1960年代至1970年代早期奠基於手工業而帶來的出口繁榮，再到197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早期大量產業升級為重工業及高科技產業。並且，經濟發展的成果廣施眾人，實質地減少了貧窮與收入不平等的情形，創造了一個「公平增長（growth with equity）」的紀錄（Chan and Clark, 1992; Galenson, 1979; Gold, 1986; Wade, 1990）。政治層面上，在國民黨政權明顯因為正處於戰後期間而發展遲緩時，台灣於1980年代中葉至1990年代中葉經歷了一個平和、合意的民主轉型（Chao and Myers, 1998; T. J. Cheng and Haggard, 1992; Y. H. Chu, 1992; Copper, 1997; Fell, 2005; Rigger, 1999b; Tien, 1989, 1996a）。

儘管擁有這些顯著的成就，台灣很快地陷入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日益增長的衝突與威脅，並擔心先前自誇的經濟空洞化，以及國內政治的極化和僵局（Clark, 2006）。常見於工業化的進程中（Kuznet, 1976; Rostow, 1960; Schumpeter, 1950），許多國家的傳統產業被迫移轉海外，尤其是前往中國尋求廉價勞力。此外經濟承受不斷增加的壓力，其壓力來自於接替台灣舊產業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上發達的國家在已存項目上嚴峻的競爭，台灣面臨雙

邊競爭夾擊的困境（J. Wang, 2010）。而且隨著不斷的與中國經濟一體化，創造了對政治敵人的依賴，使其藉此威脅以試圖消除台灣的存在（Kastner, 2009）。在政治上，國家的新民主制度呈現出來的樣貌是超級黨派之爭（hyperpartisanship）以及永無止盡的政治、個人鬥爭帶來的政策僵局，而政治化的經濟政策制定與一件一件醜聞亦隨之而來（Clark, 2006; Tan, 2008）。

我們在此提出台灣在二十一世紀早期面對的許多挑戰，是源自於先前的成功所耗費意料之外和預期中的代價。事實上，在台灣快速發展的軌道中，某一時刻為促進成功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所作所為，後來在變動的環境中反而適得其反。舉例來說，在經濟領域上，中小型企業（SMEs）是推動台灣自1950到1980年代產業升級的主要動力（Lam and Lee, 1992; Myers, 1984; V. W. C. Wang, 1995; R. I. Wu and Huang, 2003）；但到了1990年代，這些特質在過去讓中小企業得以如此成功，後來卻削弱了他們為台灣未來成長的能力（J. Wong, 2010; R. I. Wu and Huang, 2003）。政治上，民主化終結了專制的濫用（Rigger, 1999b）以及促使主要政黨更能反映公眾的期望，如創造了現在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好的健康保險系統（J. Wong, 2004）；相反地，民主化亦使得有效的政策制定更加困難，因其政治化經濟與財政政策（Tan, 2008）亦極化了政治制度上的族群認同（Clark, 2006; W. C. Lee, 2005）。

即便台灣不斷面臨隨之而來的挑戰，仍不應該掩蓋其主要而重大的成就。得來不易的民主現在已經可以被認為是鞏固且正當的，其成就值得肯定。例如選舉的結果和權力轉移被廣泛接受，而威權時代的政治壓迫和濫用已無法想像。在經濟領域，台灣變成一個公平的繁榮社會，維持相當程度的成長，而中國並無法從兩岸不斷成長的經濟整合中試圖獲得更多利益。

因此，諷刺地說，台灣現在正面臨著先前發展的成功所帶來的代價。也就是說過去得以運行的制度和策略到現在反而適得其反。這使我們想起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1982）於《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所提出的理論，他主張一般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的政治穩定，將會變得機能失調；當它與強大的利益團體連結在一起時，會運用他

們的政治影響力來扭曲經濟以追求他們個人的既有利益。對台灣來說，此一理論觀點明顯混合隱晦意涵。一方面，它意指中華民國現在面對的「成功的代價（cost of success）」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還沒完全黯淡的現實狀況提醒著我們國家半世紀來在面對發展的挑戰時所展現出來的彈性和成功。

本書規劃

在本書一開始的前兩章我們探討中華民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在這些章節中，我們提供了一個政治經濟的概論，並呈現其發展的歷史進程與過去的成就是如何創造現在必須處理的「成功的代價」。在接下來的三個章節中，我們將討論台灣現在面臨三種不同型態的挑戰：首先是經濟形勢；其次是國家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問題；再者是兩大黨所作出不當的政治策略是如何造成惡意的極化與政策僵局，雖然有一些信號顯示政治溫度有趨向溫和的趨勢。最後，我們尋求為當代政治經濟描繪一個不偏頗的樣貌，並做出結論，儘管過去的成功伴隨著代價，台灣仍透過折衷而非正統的方式持續進步。

在第二章，我們分析台灣的經濟奇蹟。在195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早期之間，台灣的經濟歷經了一連串經濟轉型，從以農業為主到出口導向的輕工業、再到重工業、高科技產業以及一些高階的服務業。回顧這些轉型的發生是相當快速且出人意料地平和。它們亦呈現出一個在國有與私有企業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這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因政府由外省人主導（如那些於1940年代晚期與蔣介石一同來台的人民），而商業則是由本省人主導（如在日本殖民時期之前就移居來台的中國移民）。國家明確地扮演了關鍵角色來推動國家的經濟轉型，但僅是明確，而非如同日本、韓國等其他發展國家投入高度的投資產業政策。確實地，經過1980年代，台灣核心的出口富礦帶（bonanza）來自中小企業與這個政權有直接的連結。在這一章裡，我們描述第一次台灣經濟轉型中四個原則性舞台（我們將於第四章中討論第五個），呈現兩個個案研究以提供更多細節和細微的差異來分析，並引證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之模型。

在第三章，我們討論出乎意料容易的民主轉型。工業化或多或少創造了

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而他們要求政治參與和改革（Jackman, 1975; Lipset, 1959; Neubauer, 1967）。從這個觀點出發，民主化在台灣似乎是受到蔣介石的極權國民黨明確地推遲，到1980年代晚期民主轉型尚未真正地開始。然而一旦開始發生後，它進行地十分平和與快速。如同經濟的轉型，分歧的團體從台灣成功的民主轉型中得到應得的信用。事實上，改革者包含執政的國民黨與這個政權的政治反對者，即組成民主進步黨的這些人，幫助推動政治改革，並為民主創造了一個寬厚的基礎。我們在這一章的開頭會對威權時代做一個簡短的摘要，隨後概念化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政治協定的條款，用以描述國家政黨體系的自然進化，並且討論主要議題如何去幫助形塑政治競爭。

第四章中，我們認為台灣正朝向一個不斷面臨夾擊（boxed-in）的經濟體進化。中華民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世界中快速發展的先驅之一。這同時帶來優勢與劣勢。一方面，在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有一些發展策略的模型，使得它對出口導向所帶來的成長之信任產生疑問。另一方面，全球化與國際產品循環鏈開始將重要的產業自己開發國家遷出，台灣處於得利的位置，得以在此經濟機會中獲得優勢。相反地，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台灣在經濟上的成功卻也逐步地限縮了這些機會，並使其經濟有所受限。台灣不斷增長的繁榮現在幾乎要因漫天喊價而失去在世界經濟中的廉價勞工利基，使其失去能夠跟上國際產品循環鏈的競爭者十分重要的部分。這部分的損失大多是轉移至中國，因為與其經濟整合逐漸加強，對於這個政治崛起並威脅著台灣的超級強權造成了潛在令人不安的依賴。此外，如同台灣與先進工業（或準確來說的後工業）國家之間的差距縮小，台灣有能力在逐漸增加的壓力下與他們競爭。舉例來說，歷經1980年代，中小企業是台灣充滿活力的出口經濟之核心。然而，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的舞台上因升級而經歷了一段艱困的時間，而且他們的式微幾乎是與台灣不斷嚴重的不平等與社會緊張連結在一起。我們在這一章的開始先將經濟發展的普遍模式進行理論性的概念化，並運用這個模型來解釋台灣於1980年代晚期以來快速的發展以及從那之後逐漸減緩的成長。然後我們闡明一個論述，此論述認為台灣近來的經濟挑戰至少部分是源自於過去的成功所帶來的結果，並透過兩個案例研究來評估台灣經濟是受限於中小企業角色的改變還是海峽兩岸逐漸緊密整合的經濟。

在第五章裡，我們舉出一系列民主危機所帶來的問題。台灣的政治制度是承繼自威權時代，因而限制民主政治以及製造了一些不良的影響，如政策僵局危害了政府的能力去有效地回應變動中的經濟與國際環境。有兩個直接的原因導致於此：一是制度權威（權力）模糊不清，因為過去的強人領袖（如蔣介石總統和蔣經國總統）一般來說並不會太拘泥於制度的細節，因此對解決憲法的異常並不感興趣。舉例來說，在民主時代裡是總統或行政院長負責掌控行政機關，以及行政院長與內閣是從屬於總統還是立法院（或兩者）等存在著模糊不清的問題。二是台灣存在著淵遠流長的裙帶政治（patronage politics）傳統，但經濟政策很清楚地與之隔離。在民主時代，這樣的分野遭到破壞，因為政治家需要更多的資金來維持其政治競爭力，也因為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並不情願亦沒有什麼熱情來打擊貪腐，因此經濟政策變得更加政治化，如此一來削弱了國家推動發展的能力。在這一章裡，我們討論所有的制度性紛擾，並提供一個詳盡的個案研究用以說明財政部門的政治化。

第六章中，我們從台灣政治中不正當的政治策略來檢驗極化。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華民國的政治競爭變得十分兇猛且帶有針對性，使得正常地制定必要政策變得難以達成。這，再一次地反映了在威權統治的時代之下，能尊重其他政治意見的民主體制被壓制並遲滯發展。然而，出現了一些其他的因素並促成一個政治類型，改寫了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962: 11）的著名描述，而這類型的政治是骯髒、殘忍且永不停歇的。當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相處在1990年代末變得相當和諧，兩者明顯地達成結論，即是關於他們最佳的競選策略乃是訴諸於其堅定的基礎支持者。這個結果造成了在一些如國家認同和與中國間關係的核心議題上，菁英階層與一般公民兩方嚴重的極化。所以幾乎所有政策主動權的合法性（正當性）都會與無關的國家認同連結在一起，隨之而來尖銳的挑戰與重要的議題因此經常被忽略。所有討厭的政治環境使得全部政策制定，包含經濟政策，都變得非常困難，造成僵局與制度性的停滯。在這一章中，我們描述台灣政黨極化的爆發，並檢驗一切可用來解釋其為何發生的因素。我們分析公共意見的數據資料，顯示出菁英和普羅大眾在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議題上的意見並不一致。最後，我們提出解釋何以台灣主要政黨按照公眾意見分布的觀點來看其行為會有不合理之處。

在第七章是基於不符正統的折衷說，我們尋求提供一個合適的答案來解釋台灣如何回應這些它自己造成的成功代價。台灣現在面臨許多挑戰，然而這些不能掩蓋這個國家應當感到驕傲的那些成就。它是一個鞏固的民主、繁榮的社會，並且仍是有活力的經濟體；以國際標準而言，它亦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國家；以及半世紀以來它能富有革新精神與靈活地回應內外嚴峻的挑戰。除了出色的經濟和政治的壓力、混亂，台灣在面對成功伴隨而來的代價時展現出它的能力與適當的解決方法。我們在本章的開頭提出台灣現今必須面對的成功代價之模型，隨後總結一些因素後提出台灣應保有持續的適應力以面臨這些挑戰，並以一個論證作為總結，即台灣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是得自於其適應性，而此適應性乃源自於國家不符正統的折衷。

第二章 經濟奇蹟

台灣自1950到1990年代間的快速工業化常被稱為經濟奇蹟。僅在數十年間，政府成功地引領了許多基礎及結構上的轉變，將經濟與貧窮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公平、均富的工業甚至是後工業社會。然而在過去的十年左右，台灣的經濟成長明顯趨緩，用來解決當前經濟挑戰的最佳策略顯得模糊不清且極具政治上爭議性。雖然政府在國家本質的正當性上存有極大爭議，但仍被普遍認為在台灣快速發展中扮演主導的角色。因此欲檢視台灣經濟，應聚焦於關切何者對促進發展是有用的，而何者是徒勞無功的。

在台灣快速發展的歷程中，可分為五個主要的結構轉型時期：第一個時期發生於1950年代，由農業轉型為國內輕工業的快速發展期。第二時期，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令人印象深刻的輕工業出口榮景與產品加工，見證經濟改革及社會巨大的轉變。第三個時期則自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提升至重工業與高科技產業。第四個經濟成熟轉型期則發生在下一個十年，包含首次發生的重要經濟損益。一方面從高科技工業的茁壯以及中產階級的崛起中獲利，但另一方面成熟的產業卻必須逐漸移轉到海外，主要是中國大陸。最後一個時期，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有另一個經濟挑戰以及來自成熟產業加速的流失（如果有的話）。對此台灣已嘗試轉型為更先進的生物科技產業以為因應（Clark, 1989, 2009）。

本章提供1990年代台灣成功的經濟發展概述，我們先以四個部分來歸納台灣國家經濟前四個結構的轉型，後續提供二個工業發展的案例研究，以更多細節來闡述台灣政治經濟的本質。下一個部分我們將台灣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予以概念化，最後思考台灣發展模式的全盤本質。

從農業轉型

1949年國共內戰失敗，蔣中正與國民黨政權撤退到台灣後，面對一個貧困、飽受戰爭蹂躪且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與重建，國民黨管理部門首先進行激進的土地改革計畫，而後迅速的提出管制，推動輕工業以替代進口，上述二者獲致極大的成就。此外，政府普及初等教育，增加國家的人力資本，亦有助於國家後續的發展成果。

土地改革計畫有三個部分：(1)1949年減租37.5%；(2)1948至1958間一連串的銷售，將公有農地賣給當時耕種的農民；(3)1953年耕者有其田法案，強迫地主將三公頃以上的農地賣給政府，然後再賣給佃農。這個土地使用權快速的移轉獲得農復會（JCRR）所指導的一個農業技術推廣計畫的輔助與支持。農復會成立農民聯合組織，來推廣新技術、行銷和信用合作以及參與農業規劃。政府亦承諾達成農業的現代化，在1950年代農業投資占全國總投資額的五分之一，且平均每年有14%的實際增加率（S. P. S. Ho, 1978; Koo, 1968; Yager, 1988）。

整體而言，土地改革激勵小佃農的創新與生產，而政府的計畫則能聚集更多資金、地方參與以及技術創新，這二項農業因素的效果因其關聯性及互補性而密不可分，亦深深影響台灣的農村生活及經濟。1959年的土地改革使佃農的主要收入增加44%（S. P. S. Ho, 1978: 169），1950年代農產品每年以4.6%成長和大量的農產品出口（Gallin, 1966; S. P. S. Ho, 1978; Thorbecke, 1979; Yang, 1970），農業盈收使工業化有了資金挹注。農業資金的流出起因於「藏米稅」，即政府壓低稻米的價格而抬高售予農民的肥料價格所獲得的盈收。諷刺的是，這與日本殖民時期所執行的政策十分類似（1895-1945），其區別在於日本從殖民地中奪走這些資源，而台灣則用來資助1950年代的工業化（S. W. Y. Kou, 1983; T. H. Lee, 1971）。

政府亦迅速提升工業化產品的產量，而這些產品之前是需進口的，因此，關稅被大幅提高，對特殊物品尤其是奢侈品實施配額，徵收國外交易稅來抑制進口的進口替代計畫，對台灣工業化歷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是刺激工業

的成長，其次是國家的工業基礎從食品加工擴展至其他輕工業（如紡織品、鞋類、自行車、橡膠、皮革製品以及化學品等）。第三個影響是，這些新興工業屬勞力密集型，此亦符合國家利益。綜合數據顯示，這些政策非常成功。舉例而言，儘管工業產品成長率有很大的波動，但在1952年至1959年間每年仍有11.5%的成長（Galenson, 1979; S. P. S. Ho, 1978; C. Y. Lin, 1973）。

另一個促進公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是教育，台灣在1950年代實施小學義務教育，1968年將小學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至九年，除了義務教育外，亦大幅提高了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機會。政府對教育大量投資使受過教育的人口增加，可以儲存人力資本，有助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勞動者及企業家的形成，並使個人從快速社會經濟變動的工業化中獲益（T. E. Chen, 1981; P. H. Huang, 1984; Wei, 1973）。

綜合數據顯示，台灣的經濟在進口替代階段中表現相當不錯，如表2.1所示，1952年實際經濟增幅為12%，超過1953年及1954年的9%，雖然接下來的八年是下滑的，但也從未跌破5.5%，1952年至1962年期間強勁地成長7.9%，表2.2比較1952年至1962年的經濟情況，雖然匯率波動造成新台幣兌美金在170美元以下的價格停滯，1962年的國民生產毛額（GNP）因經濟快速成長，較1952年增加1至1.5倍。進口替代計畫很明顯地對製造業產生刺激，國內生產毛額（GDP）從11%上升至17%，成長了50%，雖然農業從業比重由56%輕微下降至50%，但仍以農業為主。

在此時期末，新興工業產品開始出口，在台灣所有工業產品出口額中，從1958年的14%急速增至1962年的50%。但總體而言，出口量仍不多，約占GDP的10%，台灣長期的貿易逆差則約占GDP的5%。在此期間，儲蓄率從GDP的9%上升到12%，對一個貧窮國家而言是相當不錯的。由於美國外援大量流入，投資率在上半年再次提高（Jacoby, 1966）。外國企業的直接投資占GDP的1%到2%。在此期間，政府支出維持在GDP的五分之一，如同政府管理部門所奉行的穩健財政政策及成功的反通貨膨脹政策之一（S. W. Y. Kuo, 1983）。由於土地改革計畫，台灣成功地降低貧富極度不均的程度，將最貧窮與最富有的人口收入比例成功地減少幾乎一半，從20.5%下降至11.6%。